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0)03-0257-07

# 徽州文化景观初步研究

黄成林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研究了徽州聚落和民居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因素, 探讨了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自然环境协调和谐, 人文环境特别是徽商的经济实力和徽人传统观念, 是影响徽州文化景观表现形式和文化底蕴的主要因素。徽州文化景观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 徽州; 文化景观; 徽州聚落; 徽州民居

中图分类号: G 07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景观丰富多彩, 文化地理学更多地注意研究聚落布局、建筑物式样和土地利用形态等<sup>[1]</sup>。徽州文化是南宋至清末在皖南徽州崛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内容丰富, 成就辉煌, 诸多文化现象自成体系, 具有全国性影响, 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文化发展的标本<sup>[2]</sup>。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徽学正在崛起<sup>[3]</sup>。本文主要研究徽州聚落和民居景观。

## 1 聚落景观

民居是聚落的基本单元, 聚落是民居的综合表现。在徽州民居基础上形成的徽州聚落, 无论其选址、规模, 还是形态, 既有与周围自然环境适应协调的成分, 又受堪舆说等诸多人文因素的影响, 既有着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山水、生态、宗族、趋吉意象<sup>[4]</sup>, 又有着与山区农村聚落一般规律不同的一面。

### 1.1 聚落选址

出于对宗族兴旺、人文发达、财源茂盛的追求, 徽人对聚落选址慎之又慎。“依山建屋, 傍水结村”, 是山地丘陵地区聚落选址的一般规律。这种选址模式有地势高爽、视野开阔之利, 得自然水系之便, 无洪旱灾害之虞, 方便生产生活, 是在山地丘陵这一特定的地形条件下聚落选址的最佳模式。徽州“八山半水半分田, 一分道路和家园”(康熙《徽州府志》卷 2), 除了“依山建屋, 傍水结村”外, 聚落最佳选址还要求“枕山、环水、面屏”, 具体地点则需要堪舆家遍察山水形胜后作出选择。徽州无村不卜。徽州各姓宗谱都详细记载有其始祖卜居择地之事。清道光《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详细记载了胡氏选择黟县西递作

收稿日期: 1999-11-02; 修订日期: 2000-05-31

基金项目: 教育部部级资助项目 (JS197B)

作者简介: 黄成林 (1954-), 男, 安徽贵池人, 副教授。教学之余, 主要研究文化地理和旅游地理, 先后在《地理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 合著《黄山旅游与环境研究》等专著 2 部。

为安身立命之地的经过和依据:“壬派五世祖因公务去金陵,道经西递铺,见其山多拱秀,水势西流,爰偕堪舆家入西川境,遍观形势,有虎阜前蹲,罗峰拱秀,天马涌泉之胜,犀牛望月之奇,产青石而如金,对霭峰之似笔,风燥水聚,土厚泉甘,遂自婺源迁来此间。”明人吴元满《歙县西溪南吴氏世谱》载,吴氏始迁祖定居西溪南之前,有三个村址供选择,堪舆家比较后认为,西溪南“土宽而正,地沃而肥,水辑而回,后世大昌也,遂定焉”。今天看来,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堪舆家把“依山建屋,傍水结村”,“枕山、环水、面屏”这种理想的人居环境附会上堪舆之说,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实质上徽州聚落选址是选择理想的人居环境,使居住环境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

堪舆说关于“吉地”与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具有因果关系的说法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某种意义上,理想的聚落和宅基环境为居住者提供了一个满意的生活环境,从而使居住者身心愉悦,始终能怀着一种美好的心境和理想,满怀信心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正是这种精神因素或“心理暗示”,激励着人们取得成功。

## 1.2 聚落规模

“徽州介万山中,耕获三不贍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康熙《休宁县志》卷1)。徽州“地隘斗绝,厥土刚而不化。高山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朝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顺治《歙县志》卷1)。按常理,徽州山多地少,耕地分散,交通不便,耕作半径小,应该是散居型聚落为主。然而从志书、谱牒记载和明清聚落遗存看,徽州以集聚型聚落占绝对优势,而且有的聚落规模很大。徽州“其土瘠,其民劳,不足比于东南沃壤之伦,然深山大谷中之人,皆聚族而居,奉先有千年之墓,会祭有万丁之祠,宗有百世之谱”(乾隆《绩溪县志序》)。“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它邑:千家之冢,不动一;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如黟县雉山以卢氏为聚,婺源三田以李氏为聚,歙县谭渡以黄氏为聚,溪绩上庄以胡氏为聚,休宁西门以查氏为聚,徽州呈坎以罗氏为聚等。散居型聚落仅限于大姓的庄户、墓庐和棚民(明清时期从安徽沿江等地来徽租垦山场维持生计者)。

徽州聚落以集村占绝对优势,主要与徽人聚族而居的传统和谋生手段等有关。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徽人多系中原士民后裔<sup>[5]</sup>。中原家族具有集居以显示宗族繁盛的传统<sup>[6]</sup>。中原士民聚族而居的传统风尚,加上兴盛于徽州的程朱理学的薰陶和徽州森严的宗法制度的约束,以至徽人聚族而居形成集村。另外,初入徽州的中原士民饱受战乱蹂躏,从心理定势看,聚族而居所凝聚起来的宗族力量可以使族人免受外族的侵侮。这也使得一些族人在生存环境受到限制时也不愿外迁,仍然要在宗族的庇护下生存,从而使聚落越来越大。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王世贞《赠程君五十叙》)。“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明李鼎《李长卿集》卷19)。“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康熙《休宁县志》卷7)。徽人十分之七从商,足迹遍及宇内,在外经商获利是徽人衣食之源,农作所获只是徽人生活之补充。因此,徽州集村聚居并没有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反而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在聚落中的集聚,扩大了聚落规模。

### 1.3 聚落形态

徽州聚落形态主要有线状、阶状、团状、象形等几种。线状和阶状聚落是所有山区常见的聚落形态,前者主要分布在山麓与平野接壤地带,或河流沿岸、大道两侧,后者主要分布在山坡上。徽州的团状和象形聚落很有地方特色。

团状聚落是徽州最常见的聚落形态,是纠宗聚族而居的结果。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聚落是以血缘为基础聚族而居的空间组织,血缘关系是维系聚落的纽带,体现宗法观念的祠堂是聚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嘉庆《黟县志》卷3)。在徽州聚落中,不仅每村必有祠堂,有的甚至一村多祠,长卑有序,以血缘关系为背景,分为宗祠、支祠、家祠(如黟县南屏、祁门贵溪),而且聚落建筑以宗祠为物质中心或心理中心布局<sup>[7]</sup>:家祠建在支祠周围,同宗同脉不超过五服的直系亲属围绕家祠筑宅;支祠为同宗同脉已超过五服的宗族祠堂,簇拥着宗祠;宗祠为同宗的“总祠”。

象形聚落是形态具有特殊含义或象征意义的聚落。这种聚落的形成发展脱离了“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规划性。或为追念先祖功德,或为祈求荣华富贵,或纯属堪舆之说。徽人着意使聚落轮廓按照某种图案构筑,以表达自己特定的心理趋向或空间意象,于整体形象中寄托强烈的心理追求和特定的精神象征。歙县里方村系钱氏定居地,聚落外围近似圆形,正中有一方形广场,外圆内方,整个村落似一个硕大的铜钱,而且姓氏(钱)、村名(里方村)和村形(外圆内方)相统一,象征荣华富贵。明清时期黟县西递是商贾之乡,整个聚落状于舟船,村首七哲祠象征眺台,附近的大树和牌坊象征桅杆和风帆,鳞次栉比的民居象征船舱,希冀行贾一帆风顺。绩溪石家村为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后裔所建,因当年石守信与赵匡胤交谊甚笃,常以棋交手,故该村设计成纵横有序、整齐方正的棋盘状,以追念先祖功德。歙县高岔村地形轮廓像一杆铳(土枪),是一块“凶地”,但村人在“铳”的扳机处建一座油坊,喻意“越打越发”,化“凶”为“吉”。黟县塔川村似塔,歙县洪岭村似鱼,歙县狮石村像船,徽州唐模村拟龙等,各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

堪舆说影响聚落形态的典型当属黟县宏村。宏村汪氏始祖于南宋绍熙元年“卜筑数椽于雷岗之下”;因数度火灾,发展缓慢。后人认为没有发挥风水宝地的作用,遂于明永乐年间三聘堪舆家遍察山水形胜,认定该地为“牛形”,便筑起“山为牛首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圳为牛肠塘为胃”的牛形聚落。

### 1.4 聚落空间结构

总体上,与东北、华北地区的传统聚落中单体建筑间距大、聚落空间结构松散明显不同,徽州聚落空间结构非常紧密,单体建筑间距小,建筑密度大。有些聚落除了房屋、道路和沟渠水域用地外,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用地。聚落景观和周围的水口、农田、山野景观界线非常清楚,没有过渡带。除了象型聚落外,聚落布局缺少规划,弯曲狭窄的巷道夹持在民居高墙之中,巷道宽度与两侧民居外墙高度之比一般在1/5~1/10,显得非常幽深。

徽州聚落空间结构紧密,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徽州山多地少,聚落空间结构紧密可以节约有限的平地。二是徽州鸠宗聚族而居,民居与宗祠、支祠、家祠在空间上的团聚关系,加剧了聚落空间结构的紧密性。三是为了遮阳和通风。单体建筑间距小,夏季既可以借助建筑物遮挡获得较大的阴影区,又可以借助狭管效应通风降温<sup>[8]</sup>。四是在缺少规划和“无村不卜”的基础上,每个单体建筑又要根据所在位置“卜居”,以至聚落中每个单体建筑的朝向并不完全一致,巷道狭窄,甚至弯弯曲曲。

## 1.5 水口园林

徽人将聚落水出口处称之为“水口”。 “水口”与聚落相邻。徽人重视水口建设,形成一种特殊的水口园林。徽州的水口园林,有以下特点:随山采势,就水取形,自然景观为主,辅以人工建筑(如牌坊、亭榭、楼阁、路桥、塔台、书院等)和园林植物,使山川、田野和人工建筑融合成自然和谐的有机整体,具有导向、观赏、界定、防卫等功能。

徽州水口园林和苏扬园林都师法自然,属于写意山水园,但差别很大。前者位于村野,功能多,视野开阔,面积较大,天然景观为主,人工景观为辅,真山真水,山林野趣,由村民共建共享,类似于开放的乡村公园,为人们免费提供乘凉纳荫、歇息避雨场所。后者位于市井,功能单一,视野封闭,面积较小,闹中取静,人工景观为主,天然景观为辅,如同盆景,过于雕琢,旧时为显贵富商私家园林,劳动人民难以享受。

徽州水口园林兴盛于明清时期。徽商的资金是水口园林建设的经济基础。高密度的住宅建筑使聚落丧失了原先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特色,徽人向往、回归自然,是徽州水口园林建设的动力之一。徽人行贾与入仕宦游的阅历,提高了自己的审美情趣,使徽州水口园林建设能博采众家之长。明清时期徽州堪舆说中关于水口园林的“关锁”和“保瑞避邪”作用虽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郁闭的水口林确实能减轻风害。为了祈求文运昌盛等,在水口处建文峰塔、文昌阁等,使得水口园林景观更加丰富多彩。

## 2 民居景观

徽州民居特指明清时期徽州民居建筑,习称徽州古民居,是徽派建筑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徽州民居遗存非常丰富,仅面积 $858\text{ km}^2$ 人口10万的黟县就尚存3 619幢<sup>[9]</sup>。徽州民居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已经引起国内外建筑学界的高度重视。

### 2.1 基本特征

徽州民居单体建筑(幢)平面结构是高墙围合的方形封闭空间,空间组织模式一般前为天井,后为正屋,偶有中为正屋,前后天井。天井是徽派民居的特色,是由正屋和高墙围合而成的面积很小的方形露天空隙,具有通风、采光、排水和晴天家居活动等功能。正屋一般“三间五架”,朝天井漏明,中间是半开敞的堂屋,左右居室、厢房对称分布。平面结构变形较多,根据需要,一般在单体建筑的后方向纵深方向一进一进的串联加接或在左右方向一幢一幢的并联加接,形成一屋多进(幢)、每进(幢)有天井的联幢布局格局。

徽州民居属楼居式型制,造型大同小异:高墙深院小窗,对外封闭隔绝;外墙高于屋面,低处不开窗,高处偶有小窗;砖木结构,多为二层楼房,盖房先立构架后砌墙;梁柱式的构架以穿斗式为主,穿斗、抬梁组合式为辅,节点榫卯结合,有“墙倒屋不塌”之效;木柱架在石础上,硬山式,无台基;二楼天井一侧置飞来椅。马头墙是徽州民居的又一特色,系在房屋山墙上加砌的高出屋面且随屋面斜坡呈阶梯状的墙体。

屋饰是徽州民居三大特色之一。徽州民居主要采用徽派三雕(木雕、石雕、砖雕)装饰屋宇。隔扇、棂窗、裙板、斜撑等用木雕,漏窗、门窗楣罩多用砖雕或石雕。图案取材多样,主要包括掌故传说、飞禽走兽、花卉祥云三类,多借图案的喻意或谐音表达真正的主题。徽州民居粉墙黛瓦,黑白对比,使黑色更黑,白色更白,在蓝天青山的映衬下十分素雅,给人一种祥和宁静的田园气息。

徽州民居堂屋融书法、绘画、雕刻、雅物等于一体。匾额、中堂、屏条、楹联高挂,桌椅、案几、古瓶、方镜各置其所,隔扇、门窗、板裙均饰以木雕。特别是楹联,或崇孔孟,或重教化,或倡积德行善,或论治国济世,或抒情言志,或状景咏物,妙作佳品甚多。

徽州民居门向多朝东、东南和南方,但坐南朝北、坐东朝西为数不少。特别是黟县,所有古民居都不朝正南,偶受房基限制正屋不得不朝南时,也要设法开斜门<sup>[10]</sup>。

明代和清代徽州民居差别较大。一般地,前者一楼较低,二楼高敞,二楼是人们室内活动的主要空间,屋柱以方柱为主,一楼柱枋之间为木壁,二楼柱枋之间为“芦泥墙”,木雕图案简洁;后者一楼高敞,二楼较矮,一楼是人们室内活动的主要空间,屋柱以圆柱为主,柱枋之间全为木壁,木雕图案繁锁。

徽州民居与北方四合院平面结构都呈内向方形,但二者亦有差别。徽州民居一般是三面墙一面房的楼居式型制,天井小,且不具备晒场功能,窗户小而少,室内白天采光靠天井和墙壁的散射光,无直射光,光线柔和。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是三面房一面墙的平房式型制,坐北朝南,正房五间,正房左右是耳房,东西各有三间厢房,用抄手游廊连接,庭院面积大,具有晒场和晴天家居活动场所双重功能,朝阳面大窗户采光,室内有直射光。

## 2.2 形成因素分析

自然环境和徽商对徽州民居的影响已有述及<sup>[9,11]</sup>,其他因素也深刻影响着徽州民居。

东汉以前,徽州一直为山越民族所据。东汉末年至南宋期间,因多次战乱纷纷南徙的一部分中原士民迁居徽州,并逐渐整合了徽州山越文化。徽州民居正是越人干栏式建筑和中原四合院建筑相结合的产物。

建筑是人类信念或崇高理想的表达。民居并不仅仅是为人们生活提供一个物质外壳,而是显示着传统文化内涵的复杂的信号系统,其结构、形式、布局等无不表达一定的意义,即蕴含着人们的理性、希望和信仰。徽州民居的某些特征是徽人思想观念的建筑外化。徽州民居“高墙深院小窗,对外封闭隔绝”,反映了徽人在理学之风盛行、宗法制度森严下的慎独心理。徽州民居山墙顶上砌有上方下圆状如朝天官印的装饰物(俗称“朝天印”),反映了徽人对仕的向望与追求。徽州民居“民房其外,官邸其中”,楹联“传家礼教谄三物/华国文章本六经”(黟县西递)、“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黟县西递)等,反映了徽人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徽人视聚水如聚财,露水如露财,屋面之水也需“四水归明堂”,由天井下的阴井承接,是徽人“肥水不外流”聚财意识的建筑外化。堂屋案几上东陈古瓶西置镜,是徽人借“东瓶西镜”谐音“东平西静”,祈求平安。多进房屋采用逐进抬高地坪的办法,使后进房屋比前进房屋高,一进高过一进,既符合长进深建筑的通风透光的要求,也表达了徽人企盼“步步高升”的良好愿望。

徽人重视教育,“四方谓新安(徽州在晋太康元年(280)至唐武德四年(621)称新安郡,笔者注)为东南邹鲁”(康熙《休宁县志》卷1)、“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光绪《婺源乡土志·风俗》),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徽商,“贾而好儒”,因而徽州民居堂屋陈设非常讲究,处处显示出几分儒雅。

堪舆说和传统观念对徽州民居朝向的影响非常深刻。趋吉避凶是门向选择的目标,避让、改造、符镇是避凶趋吉的主要措施。开斜门,置“石敢当”,建照壁墙,挂神鉴,都是门向避让的常见手段。黟县古民居门无南向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历代堪舆家认为,门向朝南与黟县“龙脉”“相克”;二是经商为黟人“第一等生业”,黟人相信汉代就在中国流

传的“商家不宜南向”之说；三是黟人认为“南向为尊”，非皇宫、衙门莫属。

马头墙原称防火墙，是一种由防火的初始目的演变而来的具有防火、防盗、防风、有利于邻舍粘连以节约用地等实用价值的建筑装饰，使原本单调的山墙变得富有层次感和韵律美。马头墙源于徽州。据歙县新安碑园一块刻于明正德丙寅年（1506）的《徽郡太守何公德政碑记》载：徽州因房屋砖木结构，民居稠密，屡见火灾，损失惨重。弘治癸亥年（1503）夏，广东籍知府何歆到任后，经常察访防火之策，“吾观燔空之势，未有能跃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灾在人，治墙其上策也。五家为伍，譬以高垣，庶无患乎！”防火墙由此而来。徽人出贾之风始于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至万历（1573～1620）年间徽商已成为与晋商齐名称雄全国的重要商帮<sup>[12]</sup>，沿江一带有“无徽不成镇”俗谚。我国沿江很多地方的民居都有马头墙。从徽商把徽州民俗带到寄居地的事实看<sup>[13]</sup>，从徽州马头墙出现时间早于徽商鼎盛期推算，沿江地区的马头墙系由徽商传播而至。

### 3 几点结论

#### 3.1 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地理环境的关系

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景观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叠加的景观，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反映。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必然要通过文化景观反映出来，任何文化景观本身都肯定烙有该景观形成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印记。笔者曾从文化生态角度讨论了徽州文化与徽州自然环境的关系<sup>[14]</sup>，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协调和谐关系，具体表现在制约、适应、再现和选择四方面。这同样适合于徽州文化景观与徽州自然环境之关系。无论徽州民居景观，还是聚落景观，其与自然环境之间都包含着特定条件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谐关系，这和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自我完善以达到内心平衡和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是一致的。这种和谐关系是在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很低、人地之间的矛盾尚未白炽化的前提下，人类在受制于自然、顺应自然、自然提供的可选择范围非常小的条件下的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原始和谐，和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协调发展所达到的和谐并非异曲同工。

从文化整合角度看，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徽人思想观念是徽州文化景观表现形式和文化底蕴的重要因素<sup>[9]</sup>。同样是山区，同样是聚落、民居，许多地方并没有徽州那么规整精巧，那么富有文化含量，同样是门向和聚落选址，许多地方并没有徽人那么多的讲究，原因都在于二者经济实力和观念的差异。

#### 3.2 徽州文化景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向型气质、和谐型风格和伦理型内核。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系中的一种地域文化，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特性，作为徽州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徽州文化景观，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观照或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特征。例如，徽州民居单体建筑高墙小窗的封闭式结构，徽人理想的“枕山、环水、面屏”的封闭或半封闭的聚落地形结构等，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向型气质的表现。徽州“无宅不卜”、“无村不卜”，实际上是选择理想的居住环境；民居天井虽小，却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和春夏秋冬引入高墙之内，室内与室外、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徽人努力使聚落轮廓与聚落所在地的地形、山水取得协调，并赋予特定的含义等，都反映了中国人讲究自我完善以达到内心

平衡、人际关系协调、人与建筑和环境和谐统一的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徽州民居以堂屋为中轴线左右对称，重视孝第，正房长辈居住，厢房晚辈居住，就连徽州聚落中的祠堂也尊卑有序，大小有别，宏简各异，都属于伦理型文化的范畴。

参考文献:

[1] 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31.  
[2] 刘伯山. 全面观照中国封建社会的徽州文化[J]. 探索与争鸣, 1997(11): 30.  
[3] 伍跃. 徽学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崛起[J]. 中国史研究, 1998(5): 18.  
[4] 刘沛林, 董双双. 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研究[J]. 地理研究, 1998, 17(1): 32~34.  
[5] 洪偶. 明以前徽州外来居民研究[J]. 徽学, 1986(1): 18~26.  
[6] 胡振洲. 聚落地理学[M]. 台北: 三民书局, 1977. 35~37.  
[7] 刘沛林. 徽州古村落的特点及其保护性开发[J]. 衡阳师专学报, 1997(1): 87.  
[8] 沙润.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自然地理背景[J]. 地理科学, 1998, 18(1): 59.  
[9] 黄成林. 试论徽商对徽州文化的影响[A]. 见: 周绍泉、赵华富 主编. '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 199~208.  
[10] 余治淮. 黟县[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26~27.  
[11] 黄成林.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J]. 人文地理, 1993, 8(4): 60~63.  
[12] 张海鹏, 王廷元 主编. 徽商研究[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6~10, 504.  
[13] 王振东.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98~100.  
[14] 黄成林. 徽州文化生态初步研究[J]. 地理科学, 1995, 15(4): 304.

# The preliminary studies on cultural landscape of Huizhou

HUANG Cheng-lin

(Dept. of Geograph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forming factors of the Huizhou settlement and traditional residence,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izhou cultural landscape and Huizhou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holds that harmony in Huizhou cultural landscape with its natural conditions plus human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Huizhou traders and Huizhou people's traditional idea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Huizhou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ts inside information, and Huizhou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Huizhou; cultural landscape; Huizhou settlement; Huizhou traditional residence